

乡村工匠的职业转型与技能变革

徐佳虹 迟 帅

摘要 乡村工匠的技能对推进乡村振兴具有现实价值。基于生命历程视角对X村瓦工近30年职业空间与技能转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工匠技能劳动从以村为中心到依托县域,再延展至城市劳动力市场;同时,伴随乡村工匠职业空间的转移,工匠自身的技能呈现出分化与升级的多重趋向。一方面,从乡村到城市更加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了工匠新的职业空间,他们通过习得新技能或提升原有技能构建了新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受到年龄与学历限制以及缺乏相关制度保障,工匠技能升级与职业转型面临各种困境,加之更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使其在既有的乡村社会中不占优势,在城市只能从事低技能劳动工作,甚至成为不稳定劳工群体。工匠承担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较弱,依靠技能人才推动乡村振兴,既要从制度上给予工匠劳动保护,还要营造工匠精神的文化氛围。

关键词 乡村工匠;技能社会;职业空间;技能形成;超龄农民工;工匠精神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4-0175-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163)

民间流传“九佬十八匠”,传统手工匠人往往是子承父业,倾尽一生心血只从事一种职业,他们凭借一门手艺在乡土社会游刃有余,曾是民间社会不可或缺的群体^[1](P59-61)。传统工匠对乡土社会的重要性体现在,农村手工业一方面吸附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民收入。近代以前,我国农人耕地面积极小,固无一非农人之副业也,农村农人与各行业手工艺者,实一而二,二而一^[2](P3-5),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技术涌入,农村手工业处于“半工业化”状态,与之相伴新的手工业开始兴起,这构成了近现代传统工匠命运的第一次变革^[3](P49-53)。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伴随农业集体化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乡村工匠命运面临第二次转折。研究表明改造手工行业是工匠技能控制权被动转让的过程,同时有研究认为集体化为技艺扩散创造了条件^[4](P11-58)。总体上,从近现代手工业的半工业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去集体化开始,传统乡村工匠的命运经历了多重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化与市民化等外部客观环境的变迁,中国乡村社会的劳动、就业、农务、生活与教育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一部分传统工匠的消失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5](P111-115),另一方面,城乡一体化与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赋予了乡村工匠新的挑战与机遇。眼下,推进乡村振兴需要乡村工匠发挥支撑作用,我们有必要重思乡村工匠群体的命运变革历程,还要关注当下乡村工匠的技能变革对于构建技能型社会的结构性影响。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第一,在微观视角上,工匠群体的职业空间变革对其个体生存与家庭生活有何影响。第二,在宏观视角上,工匠身份转变又会引发怎样的乡村变革。

生命历程理论为探索乡村工匠的消亡与职业变动过程提供了理论视角的切入点,它不仅重视个体的社会期望与代际更替,还将贯穿个体一生的生命过程分析和宏观的社会变迁相结合。同时,制度化的生命历程视角更有助于把握个体和社会的结构关系,有利于在现代社会的全球化背景下把握个体能动

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6](P11-65)。本研究聚焦近30年来乡村工匠的技能形成与职业转型,以生命历程研究范式,嵌入乡村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揭示工匠老一代与子代、乡村家庭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从立体构面解剖工匠的技能与职业变迁,聚焦乡村工匠职业空间与工作转型的社会性后果。

一、社会转型、技术进步与乡土社会的变革

有关乡村工匠技能劳动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技术替代论、技术互补论和文化遗产论等三种观点。尽管这些观点从不同方面注意到了乡村工匠技能断裂的外部原因,却相对忽视了工匠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一) 优胜劣汰:技术进步与技术转型

在乡土社会传统工匠世代沿袭,“奇技淫巧”只可内传从不外露,这种技术传承方式既使得工匠从一而终,也为各行各业创造了自身的“独门绝活”^[7](P81-90)。然而,科学技术革命的到来,揭开了传统工匠所持有的隐晦知识,让技术本身不再成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秘方,从根本上催发了工匠的技术转型。学者认为传统工匠的技术转型有两个阶段:近代前期传统工匠的经验型技术向理论型技术的转化,表现为一种“生产—技术—科学”的序列,到了近代中期开始出现“科学—技术—生产”的序列^[8](P79-84)。显然,后者是一种科学技术化的过程,从科学到生产的序列是科学技术革命以后主要的技术方式,而技术形态转型所产生的最大影响是生产效率的提升。对依靠手工劳作的传统工匠而言,在技术科学化阶段可能还有一定的优势,但在科学技术化的进程中已处于劣势地位^[9](P40-44)。总之,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传统技艺与工匠的影响大致存在着技术替代论与互补论两种观点。

技术替代论与互补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如何看待现代技术对于传统技能的取代程度。技术替代论认为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取代工匠的传统技艺与生存空间,而技术互补论则强调二者共生的一面。诸如余同元的研究发现江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传统工匠的技术转型在本质上符合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技术进步只是技术转型的一个引子,传统技艺与工匠最终会被现代技术所淘汰^[8](P79-84)。Chalklin的研究认为技术革命带来的规模化生产使得工厂制造的产品更为廉价^[10](P33-59),直接导致20世纪中叶英国乡村裁缝与鞋匠的消失。另有一部分研究偏向于技术互补论,比如学者发现技术机器与传统技术之间存在一种互补的关系,传统工匠并没有完全被技术革命所淹没,甚至催发了新的手工行业^[11](P54-60)。不过彭泽益认为形成互补关系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近代中国工业的机械化程度比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留给了手工技术者生存空间^[12](P125-137)。另外,彭南生也指出在近代“半工业化”进程中生产形式表现为技术进步、区域外市场和多元共存三种模式,因而科学技术对传统技术既有替代的可能,也有共存与互补的空间^[13](P121-134)。

技术替代性观点表明,科学技术革命追求产品生产的效率与质量,而传统工匠只能依赖手工劳动维持生计,当技术进步给乡村带来多样与廉价的产品时,失业是乡村工匠必然的命运。然而,一方面技术进步的替代性说法难以服众,这体现在当下对科学技术是否会“淘汰”传统技术的问题上没有统一观点,时至今日一些传统技艺仍然是新技术诞生的灵感与源泉^[14](P20-31);另一方面,技术社会学视角始终将技术实体作为研究主体,更关注技术本身的变化,却没有将技术使用者放置于科学技术革命的环境中。技术与工匠是共生性关系,乡村工匠是糅合了物化的技术与具有主动性的人的综合体^[15](P141-160),关注技术并不能取代对于人本身的分析,何况工匠嵌入在整个乡村社会的发展中。

(二) 做回农民:权力与资本的“去技能化”

“去技能化”理论开始关注技术掌握者群体,这一理论的核心是社会转型中逐渐侵入乡土社会的权力与资本瓦解了工匠与技能的融合关系,科学管理模式与劳动分工迫使乡村工匠被“去技能化”,而后沦为“无技能”农民^[16](P118-129)。其一,最具代表性的是艾约博对四川夹江县造纸村的技能与乡村变革

的分析。他认为在20世纪以后随着现代化国家的演进,权力结构逐渐渗透到传统造纸技术中,原本附着于乡村工匠身上的技能转变为了“非具身性”与“非嵌入性”的技术,造纸工匠成为被“去技能化”的农民。这一过程被视为强权对底层群体的技能剥夺,导致工匠本身的技能被抽离而成为普通农民,身份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经济与社会地位的转折^[17](P1-10)。

其二,20世纪的中国乡村除了权力对传统技能的侵染,资本也悄然侵入传统手工业。资本的涌入彻底解构了传统手工业的生产过程与技能结构,手工艺人的劳动规模化、标准化,工匠转变为工人不仅发生了“去技能化”,工艺产品背后的技能被隐藏与分解,也使得工匠自身的技艺价值不再凸显^[8](P79-84)。在过去30年里资本下乡与乡村产业集群已成为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18](P100-116),但有学者指出资本的集约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技能重组与技能成果分配的不公平^[19](P115-134)。

其三,部分研究表明资本与权力的侵入可能同时发生,共同加剧乡村工匠的消亡。比如,Kuo对四川雅安市庙下村的传统木工建筑群的考察发现,旧城区的木屋群用“川斗”建造,这种传统木框架系统需要木匠们用细木工连接结构元件,很容易拆开和重新连接,不仅能抵抗强烈地震,还能适应多种类型的空间布置。但由于大规模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建筑出现,以及国家颁布的树木保护环境政策,对此种建筑类型的需求正在下降,导致当地木匠在建筑中的角色被弱化^[16](P118-129)。

尽管资本与权力的去技能化理论弥补了技术进步观点忽略技术使用者的漏洞,但是从中也能发现这一视角下的工匠只是被操控者,只能被动接受自身技能劳动与工作被剥夺的命运。显然,去技能化观点并没有充分展现乡村工匠的技能“担纲者”身份,在外部作用下的行动选择过程,忽略了工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就需要我们更关注工匠自身的行动策略,这也凸显出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的重要性。

(三) 文化传承:劳动价值的文化赋义

文化传承论从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研究中看到了乡村工匠劳动价值的文化意义,在他们看来乡村工匠的消亡并不是技术进步的体现,反而意味着文化与艺术的失传。从艺术性视角而言,学者认为现代企业生产的产品是机械的产物,规格化与集成化是现代产品的唯一特征,而传统的手工艺品独具特色且各有差异,是有感情的物品,集合了工艺美术的特性^[20](P12-14)。从文化的角度看,传统工艺扎根于农耕时代背景下的日常劳作,具有地域性、民俗性与乡土性等特点,也承载了一种核心符号,而工匠的生产与制作过程包含了地方的信仰与风土人情^[21](P40-51),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代表了一种文化认同。

在文化与艺术的后现代视角下乡村技能工人不只是生产劳动者,还是乡土文化与民间艺术的创造者,承载了乡村文化与民间艺术的传承功能。在后工业化时代,传统工匠的劳动过程被赋予文化意义,也成为中国走向国际市场的一种本土探索。学者对景德镇陶瓷的研究发现,传统手工技术只有被视为地方文化而得到广泛关注时,才可能作为一种传统工艺而被留住,从技能到文化的转型是传统乡村工匠在后工业文明时代的一种存活方式^[22](P1-32)。这类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将工匠的文化担纲者形象与乡村社会的技艺传承相勾连,弥合了技术进步论与去技能化观点仅关注技术进步而忽视人的因素的理论缺陷。然而,文化意涵仅代表了工匠技能劳动价值的一个侧面,忽视了乡村工匠对乡土社会经济、教育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影响。由此而言,探索工匠的现实境遇与职业转型要考虑到乡土社会的整体环境,以及新时代乡村工匠职业转型背景下重塑技能劳动价值的过程。

二、个案分析与研究方法

既有文献为本研究对乡村工匠技能劳动与职业变迁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本研究将关注X村瓦工群体的技能劳动与日常生活,通过访谈收集个案资料,从生命历程视角对瓦工群体进行历时与共时性画像。

(一) X村与研究对象概况

X村位于陕西省南部,地处盆地,地势平坦,村庄毗邻国道,交通便捷,距离县城仅3.6公里。2022年村庄共有农户123户,常住总人口648人,村庄土地总面积9000亩,耕地面积298亩,主要经济作物为油菜与水稻。从数据上看2021年全县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59元。村民经济收入来源较为单一,除了农业种植以外,过去30年X村成年劳动力主要围绕三类职业工种维持家庭生计,分别为瓦工、木工、搬运工。

在X村瓦工也被称为“大工”,X村瓦工在鼎盛时期大约有30余人且全部为男性,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瓦工们分属于三个小团体,团队的老板都是人脉关系广且手艺过硬的老瓦工,一个瓦工小队人数规模在10人左右。X村瓦工的工作范围主要为周边邻村和县城,瓦工们的日常工作依附于老板的“接活”情况,一般是老板凭借关系“找活”“包活”,带领小队的瓦工干活,包括村民房屋建造、县城商品房修建、路面桥面补修等工作内容。X村瓦工近八成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拜师学艺,大部分是在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后当学徒,通常先给大工师傅当小工,而后以干中学的方式成为熟练瓦工。从X村瓦工们职业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为入职高峰期(共计34位瓦工);21世纪初至10年代中为职业稳定期;从2014-2015年开始,X村三个瓦工团队先后没落;2022年X村只有3个瓦工还从事零星的建筑类工作。

尽管X村瓦匠的技能劳动产品没有体现出强烈的艺术性与文化性,但X村泥瓦匠的技能传承至少经历了一个世纪,是典型的乡村“手艺人”。在人数规模上,到1976年X村所在的乡共计有66人,1979年前各乡镇瓦匠人数共计450人。在技能水平方面,据记载,民国25年(1936年),城乡建筑工匠在县内营造住宅、庙宇、学校,修建武侯祠、武侯墓、万寿塔等名胜古迹,工艺精巧,造型美观^[23](P40-88)。基于此背景,本研究将X村瓦工作为研究对象。大部分X村瓦工们的职业生涯发生变化,在职业空间上也不再限于以村为中心,这为本文探索乡村工匠职业技能转型与变革分析提供了契合的实证材料。

(二) 研究方法

本文经验材料源于对X村18位瓦工的深度访谈,以及X村近30年在经济、人口、文化与教育等方面的文本资料。访谈与资料收集一方面围绕X村瓦工从入行到转行的工作与日常生活变化历程,另一方面记录发生在瓦工家庭的重大事件和X村的变化。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与职业发展历程如表1所示,这实际上也代表了X村大部分瓦工职业生涯曲线,在2012-2016年是瓦工职业转型的高峰期,至今整个村不足3人从事建筑散活。资料分析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方式,第一部分主要阐述X村瓦工在技能结构、劳动过程以及个人经济与社会地位方面的变化。第二部分资料分析从生命历程视角对X村老一代工匠与子代的职业选择进行剖解,回应当下构建技能社会的时代话题。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访谈对象	从业年限(年)	转行年份	现今工作(主要)
S1	30	2016	务农
S2	26	2013	外出打工
S3	24	2015	务农
S4	27	2015	开窗帘店
.....			
S18	22	2014	外出打工

三、X村瓦工的职业空间变革

基于对X村瓦工的实证资料分析,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他们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职业与技能变革,一方面,时代发展与乡村社会自身的变化是工匠工作空间发生变动的客观前提,另一方面,工匠的职

业空间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也体现出一种主动性的选择。

（一）以村为中心：乡村工匠技能形成的起点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X村瓦工的主要活动范围以本村为中心，最远辐射到周边村落。瓦工所依附的团队在传统上是一种非正式组织，团队运行逻辑基于乡土社会的关系与信任。首先，瓦工初入团队时均是以学徒的身份跟着老瓦工打下手，老瓦工收徒通常是基于乡村人情关系，“自家人带个话”“领到家里磕个头”，一种工作上的师徒关系就建立了。X村瓦工从学徒到独立工作再到带学徒，技能形成与劳动过程都发生在团队内部。其次，瓦工的日常劳动与工作任务直接听任老板安排，老板只需要当晚告知一位瓦工第二天的工作地点与工作内容，瓦工们就会准时到达工作场地且自行安排好工作进度。最后，瓦工的工资标准与发工资时间都是不确定的，瓦工从不会在工作前询问老板或师傅工钱的问题。因为私人关系与人情往来，瓦工们与老板之间相互理解，无论是工钱何时发放的问题，还是瓦工农忙时节的迟到早退问题，熟人关系网都给予了瓦工们调和与工作与家人空间，维系了农村经济生活的基本节奏。

案例1：A生于1965年，从事瓦工工作18年，现在儿子婚庆公司做舞台搭建工作。“发工资的时候才知道今年挣了多少钱，老板也不会糊弄我们的，都是乡里乡邻的，大概的工钱都有数。每年就是9月份学生要交学费的时候发一点，过年的时候再发点。年年的帐都结不清，每年都写个四五千的欠条，这些都好说。有时候家里有急事问老板预支点钱也是常有的事。”（访谈记录20220805S10）

其一，以村为中心将亲缘、地缘网络嵌入非正式瓦工团队，为乡村技能传承创造了独特环境。基于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X村的拜师门槛较低，年轻人拜“大工”为师实际上是一种谋生手段。X村大部分瓦工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学徒，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乡村青年走向独立的第一步是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后结婚与大家分离，成立自己的小家庭。工匠与技能的融合是通过师傅的言传身教，师傅对学徒的技能教授尽心尽力，学徒要是眼明手快、悟性好、脑子快，基本上三到四个月就能上手。但是，成为一名熟练瓦工至少要达到日均“砌墙一千（一千块砖）”的水平。从学徒到成为一名“大工”，他们的技能习得过程是跟随师傅们在十里八乡工作，除了在技能水平上的提升，成为大工最大的变化是工资，20世纪90年代初X村熟练瓦工一个月平均能挣150元，不仅能养活一个小家庭，还能稍有存余。在20世纪末的乡村社会，学习一门手艺就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潜力，对青年一代而言在婚姻市场上也更占优势，因而成为一名工匠是当时乡村社会比较认可的身份。

其二，以乡村为中心的职业空间是瓦工获得乡村社会地位的关键。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初级瓦工逐渐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熟练瓦工，在团队中开始承担师傅的角色，“好手艺”甚至塑造了他们在乡村社会的地位。21世纪初以前，X村瓦工们大部分的修建工作都是在本村与邻村，熟人社会对乡村工匠的技术水平有着工匠熟知的考量标准，这些标准口耳相传，如“一打一个准”“砌得端”等。“一打一个准”是指瓦工用瓦刀能精准切割出所需尺寸的砖，“砌得端”是指瓦工不用垂线砌墙依然能做到与垂直线零误差，达到这种标准的工匠能很快获得好口碑，这种口碑在乡村社会最能体现一个工匠的水平。而乡村工匠的技能在乡土社会除了带来名气以外，本身又是人情往来的工具，是邻里乡亲构建互利互惠关系的支点。同时，凭借手艺给村里人“帮个小忙”，往往也形塑了乡村工匠较高的社会地位。工匠的技能扎根于乡村，服务于乡村，宏观上技能与乡村共存构成了技能依附型乡村，微观上工匠在乡土社会的嵌入性体现为“能人”的劳动价值对乡村场域的依赖。

案例2：B生于1963年，从事瓦工工作20年，目前在园艺公司打零工。“谁家补个墙，修个灶，叫一声有空就去了，那个时候都叫我‘能人’嘛，村里帮了不少忙。老人家去世都是找我们几个给挖墓，那个年一个衣柜里都是黄胶鞋和毛巾（X村白事习俗给帮忙的人送回礼）。04年我自己修二层的时候，上瓦那天好多人没叫，人家都来给帮忙，人情嘛都是换的。”（访谈记录20220815S13）

(二) 依托县域:乡村工匠职业空间的延展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与县的紧密联系拓宽了乡村工匠的职业发展空间。2000年前后,国家高度重视城乡关系的深化发展,在政策上积极推进农村闲余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拓宽就近城镇与县城为中心的非农经济,还提出培育新型农民等策略。在此背景下,以村为中心的技能劳动者逐渐延展至县域,比如X村瓦工的工作空间从以X村为中心的周边村落转移到M县城。除了工作空间上的变化,进入县城劳动力市场后,X村瓦工团队的组织结构开始偏向正式化,同时,高层商品房修建与学校建筑翻修等较为复杂的工作内容也相应提升了瓦工们的职业技能。整体上看,依托县域经济是X村瓦工走向城市的重要过渡期,瓦工们在工作空间与职业技能上的变化,也间接影响着他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

其一,工作范围向县域空间的延展提高了X村瓦工们的技能要求,在团队组织管理上也更为严明。21世纪以前,瓦工们以X村为中心,主要工作内容是村民自建房修建,比如土屋换砖房,平房换二层小楼等,工作难度较低。21世纪初,X村瓦工团队老板开始在县城“包工”,比如承包县城一中宿舍楼的修建工作。随着工作空间的转移与工作内容的改变,X村瓦工面临新的工作环境,也包括在施工质量上受到第三方监控,间接拉升了瓦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城里有城里的规矩,给公家修房有监理,自己估量的都不行,要拉尺子掉垂线都少不了,不会看图的要补功课”(访谈记录20220815S5),这充分体现了乡村工匠在县域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提升个人技能水平以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另外,在村为中心的工作阶段,瓦工们的劳动时间不受严格限定,但在县城的工作需要配合“公家”的时间,上下班时间固定,继而也反向推动了X村瓦工组织的正式化管理。“老板打印了考勤表,每天早上七点半,下午六点半要去签字,迟到就要扣钱”(访谈记录20220815S512),多份访谈记录说明瓦工团队在县域市场的发展中组织管理逐渐走向正规化。

其二,职业空间转移到县域后,瓦工们的劳动市场拓宽了。工匠劳动空间以县域为轴心,稳定的工作量不仅是乡村工匠经济收入的基本保障,也使得工匠有时间照料家庭农业。进入21世纪后,瓦工们的工作空间逐渐转移到县城,因为X村距离县城仅三公里多,瓦工可以每天往返于城乡。首先,在经济发展上,X村瓦工在县城干活可以同时兼顾农业,一般瓦工会在上工后或上工前协助家中女性完成农务重活,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经济模式。县域市场劳动与农业辅助的模式保持了乡村经济活力的良好运行,打破以村为中心的职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乡村工匠技能劳动的增值^[24](P54-76)。其次,乡村工匠的工作地点以乡村为中心,基本每天都可以往返家中。在一定意义上,工匠“在家”给予了子代稳定的家庭环境,避免了子代成为留守儿童的情况,奠定了X村儿童教育与心理良好发展的基础。最后,从乡村到县域市场的劳动空间扩展给予了工匠稳定的工作机会,这一阶段X村成年劳动力基本都有一份额维持生计的稳定工作,村中游手好闲的人较少,各有所长也推动了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营造了较好的乡土民风。以村为中心与依托县域的职业空间为工匠“在家”提供了场域,一方面有益于工匠对子女的照料与教育,另一方面也为乡村经济发展贡献了力量。

(三) 走向城市:乡村工匠职业空间的层级化

进入21世纪10年代后,伴随城乡一体化与户籍制度改革,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加速。以X村为例,瓦工们在20世纪末以村为中心,到21世纪初转移到县城市场,2010年后逐渐超越县域职业空间,开始转向距离更远、就业市场更广的一二线城市。走向城市为乡村工匠职业扩展打下了基础,乡村技能劳动者的高流动性也打通了城乡之间的一体化发展,除了流向大城市,乡村工匠也渗透到邻省或邻县的劳动力市场。原来以村为中心的乡村技能劳动者迈向多元化的就业市场,这不仅重塑了他们既有的劳动空间,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职业发展路径。总体而言,乡村工匠群体向城市劳动力市场进军,一方面技能劳动者本身职业空间的扩展为其带来了新的就业前景,另一方面乡村工匠的城乡流动与职业转型使得工匠原来依附的技能发生变化,由此也改变了技能劳动者的经济与社会地位。

其一,从X村的数据资料来看,自2012年前后,随着“外地人”的专业化建筑团队涌入,X村瓦工们的非正式组织在工作搜寻与管理制度上难以匹敌。这里的“外地人”实际上是一个外省建筑公司,该公司从2012年拿下县城几个大型基建招标项目后,陆续接手了县城大大小小的建筑项目。规模化建筑团队的出现,采用层层分工、任务分包的组织模式,在项目工期上比依靠非正式组织与熟人关系的乡村瓦工更具效率,虽然不能比较二者在成本预算上谁更具优势,但专业团队的揽活能力远远高于散工组织形式的乡村瓦工。在此背景下,以县域为中心的职业空间不足以支撑X村瓦工们稳定的工作量,这直接推动了X村技能劳动者流向更广的就业市场。于此而言,城乡一体化对于乡村技能劳动者既是一种新的挑战,也是一种新的就业机遇。从统计数据上看,X村瓦工在2014年后逐渐退出县域劳动力市场,近乎一半瓦工向县域之外的市场迈进。

其二,如果说支撑X村瓦工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稳定工作的基础是非正式组织的人情与信任,那么专业化建筑团队的运转机理反而是严格的管理规章、正式组织关系以及层层分包制度。规模化建筑行业雇佣灵活,进入门槛较低,建筑工人的商品化加强了雇佣劳工的不稳定性,就业压力大客观上要求底层劳动者恪守严格的管理制度^[25](P5-26)。而乡村瓦工从一开始就出身于乡土社会,他们的技能形成与劳动过程深深嵌入于乡村经济与乡土文化环境中。以X村瓦工为例,抽离既有的乡土环境向更广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进军面临重重困境,由此也导致他们的职业变动与新技能习得。总体上,X村的瓦工们以及其他类型的乡村工匠基本有三种流向,一部分年龄超过65岁以上的技能劳动者选择在家务农,农闲时打散工维持基本生计;还有一部分工匠进入邻省与邻县劳动市场;另有一些去了沿海城市寻找打工机会,40%的人继续从事与自身技能相关的工作,其余工匠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职业转型。

四、X村瓦工的技能分化与生活重构

乡村工匠职业空间的历史变迁展现了乡村技能劳动者工作范围与工作场所的变革,工匠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直接结果是职业发展的多元化,背后展现了工匠技能劳动的新变化,这些变化重构了工匠经济与社会生活。反过来,工匠个体生活变革也重塑了乡村社会。

(一) 工匠技能升级与生活重构

从前面的历史分析可以发现,伴随乡村工匠职业空间的扩展,工作环境与工作任务的复杂化直接推动了工匠技能升级。技能对乡村工匠而言是获得基本物质生活的保障,在乡村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基本具备了养家糊口的经济能力,乡村工匠的职业变动也就最先映射到他们自身的生活与地位上。在X村瓦工劳动空间从乡村到县域再到城市的移动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工作空间与新职业,乡村工匠不得不变自身知识结构,学习新的专业知识提升工作技能,这实际上推动了他们的技能习得与技能升级。

以X村瓦工为例,从乡村到县域的工作空间转移催发他们提升自身技能,这包括完成复杂工作任务的能力与适应新工作场所的能力。技能的具身性预示着乡村工匠在乡村生活的有机性,工匠技能劳动支撑了工匠乃至整个乡村的技能发展与经济生活。工匠与技能的耦合是物理身体与技术的融通,代表了技能形成的完备状态。与之相应,瓦工的技能提升引发了个体生活的重构,而这也间接影响着乡村社会的日常。不过,以县域为中心的技能劳动迁移,工匠只是在家与县城之间的位置移动,基本上还保留了乡土社会的运作圈。且技能升级有助于工匠在县域市场稳定就业,这给予了工匠相对确定的生活与工作节奏。

2012年前后,伴随县域劳动力市场的扩展,X村瓦工走向离乡村更远的城市,这再次推动了工匠的职业空间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发了工匠有关建筑劳动的技能提升。以X村一位瓦工的个人经历来说,自2015年进入东莞建筑行业后,其先后自学了项目管理、图纸与测绘、工程质检技能等,于2018年组建了自己的建筑团队。显然,个体职业技能的提升赋予了技能劳动更高的增值空间,通过技能升级又实现了工匠个体经济地位的提升,从而给予了工匠融入城市生活的依附点。工匠虽然在地理距离上远离了

乡村,但其“根”在乡村,技能升级的辐射效应也随着工匠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来回移动扩散至乡土社会。

(二) 工匠新技能习得与职业转型

技能形成依赖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的不断积累,乡村工匠的技能升级依附于工作场域中的“干中学”。从前述分析可知,尽管乡村工匠的技能升级是其经济与社会地位稳步提升的前提,但受到客观环境、年龄与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瓦工都能通过提升技能融入城市。相反,从乡村到城市的职业空间移动加速了瓦工工匠群体的消逝。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农业税等政策的调整,农民种地的外部压力减少,但较高的人力资本投入与较低的收入回报,致使种地在乡村不再是一个核心经济来源^[26](P4-10)。

因此,乡村工匠的技能就成为农民的主要生存工具,一旦这种技能无法维系生计,在缺乏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性保护时,获得一份新的工作谋生是乡村工匠最根本的生存原则。即便是拥有多年的建筑工作经验,在建筑工作越来越少的情况下,X村瓦工也不得不及时寻找新的工作。但正如前面所述,乡村工匠在总体上都面临着转型困境,不仅是瓦工工作受到冲击,木工、水电工等也出现工作量减少的情况,在资源与消费极其有限的乡镇与县城再就业成了公共性的话题。

当乡村工匠的原有劳动空间发生变动,做回农民并不是瓦工的第一选择。大部分瓦工选择转向其他工作领域,从建筑劳动力市场退出后通过习得新技能寻找新工作。从X村瓦工的职业转型来看,走出乡土社会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后,一部分瓦工依靠既有的熟人关系圈开拓新的职业领域,比如在县城开窗帘店,在邻县的学校周围开餐馆,整体上实现了工匠职业空间的横向延展。值得关注的是,城乡一体化与农民市民化发展不仅推进了乡村工匠的职业转型,也塑造了工匠多元化的职业空间。另外,脱离原有工作场域向新职业的迈进需要习得新技能,部分工匠通过地缘、亲缘与熟人关系成功跨越新工作的职业门槛,熟人给予的经验性指导与技术支持为其技能习得提供了捷径。

案例3:C生于1966年,从事瓦工工作19年,目前在县城开窗帘店。“那几年瓦工形势不太好,我就盘算着干点啥,我看我家兄弟城里的窗帘店还可以,人家做窗帘20年了有经验,说了说我兄弟就带我入行了,我啥都不懂,都是人家一手带的。没两年你看现在整条街都开满了。生意也是越来越难做了。”(访谈记录20220815S4)

(三) 工匠技能分化与再就业困境

正如前面所述,一方面瓦工工匠必须提升技能维持原有工作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瓦工不得不转向其他领域寻找新的工作。这两种情况下出现了两种极化的技能状态,其一是依靠技能升级或新技能习得获得新工作的工匠群体,在生命历程上他们开启了人生新阶段;其二受到诸如年龄、制度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另有一部分瓦工相比于生命历程的前段,成了周期性不稳定劳动工。实质上,乡村工匠的技能分化凸显了工匠群体在现阶段的就业困境与两难处境,这尤其体现在工匠从乡村到城市的职业空间移动过程中。

近年来,X村先后有十几人结伴前往珠三角城市,但是因为年龄限制,企业在社保缴费问题上严格卡关^①,仅有部分工匠进入了工厂,而且只能从事低技能岗位需求的产线工作,他们对劳动强度与工作时间的适应能力也比较弱。可以预见的是,当乡村工匠进入大城市寻找新工作时,一方面,乡村工匠在专业知识上欠缺,没有职业资格证书,无法获得与自己技能相匹配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大部分工匠年龄在50岁以上,在劳动力市场并不占据优势。由此,工匠在大城市的再就业只能从事进入门槛较低的工作。随着雇佣形式的灵活化与外包化愈演愈烈,低技能岗位的劳动者被裹挟到不稳定劳动体系中,无疑离开故土试图再就业的乡村工匠难敌此种宿命,从稳定工作到不稳定劳工,从乡村工匠成为大城市中悬

① 法律规定企业必须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而年龄在60岁以上的农民工超过了缴纳年龄的上限。

浮的“超龄农民工”^[27](P66-69)。

乡村工匠在劳动年龄上受到限制,无疑制约了他们在技能型社会的技能重塑。据统计,当前中国有8000万超龄农民工,正如在X村寻找再就业机会的瓦工一样,无数超龄农民工试图在大城市找到谋生的工作,但由于各种限制,他们只能处于劳动力市场的底端,从事低技能劳动工作,而每当诸如“清退令”的规定出现时,又加剧了他们就业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风险。“进退两难”代表了大部分超龄农民工的现状,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曾经是身怀绝技的手艺人,现今也只能成为不稳定劳工中的一员。现阶段构建技能社会必然需要这样的群体,而随着乡村工匠所处的劳动市场越来越小,大城市超龄农民工只会越来越多,这对于技能型社会的构建可能是一种阻碍,但如果能有效提升或给予乡村工匠技能培训与再就业支持,就可能转化为正向的推力。

五、结 论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强调依靠职业技能振兴乡村,提出推进乡村职业教育,培育乡村工匠。本研究通过分析X村泥瓦匠近30年的职业生涯与生活日常,发现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工匠群体的职业空间经历了从乡村到县城再到大城市的扩展,但在更广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他们的职业与技能却面临多重走向。一方面,部分工匠通过新技能习得与原有技能的提升获得新的工作,实现了职业转型,成功进入县城或大城市生活;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工匠受到自身学历水平与年龄限制,同时外部缺乏对他们的职业培训与基础公共服务保障,使得他们成为不稳定劳工群体。本研究从生命历程视角聚焦乡村工匠的职业空间与技能转型,呈现了开放性劳动力市场下乡村工匠的职业发展路径与多重困境,回应了现阶段构建技能型社会的社会治理议题。

依靠职业技能激活乡村的关键是有效发挥工匠的重要作用,在乡村内部为既有工匠提供与其技能相匹配的工作机会与薪资待遇保障。比如,聘任乡村工匠为职业学校的实训指导教师、开办技能提升工作坊、利用新媒体推荐乡村工匠。对外则依附于国家制度与政策方针,赋予乡村工匠技能工作相应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积极推动高技能水平人才融入乡村建设。本研究认为构建稳定的技能形成体系需要基于一个有效的制度保障框架,确保技能人才具备应对由技术进步引发的替代性风险的能力,更为关键的是要保障技能劳动获得应有的薪资报酬与社会福利。

参考文献

- [1] 邹其昌,李青青.《史记》的工匠文化观——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研究系列之八.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 [2] 何康. 我国今日之经济地位. 纺织周刊,1935,(4).
- [3] Robert P. Gardella.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 Silk Production and Exports, 1861-1932*.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86.
- [4] 艾约博. 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1920-2000). 韩巍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 [5] 伍慧玲. 农业供给侧改革下高职院校培育乡村工匠研究. 农村经济,2018,(2).
- [6] G. H. 埃尔德. 大萧条的孩子们. 田禾、马春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 [7] 关晶. 西方学徒制的历史演变及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1).
- [8] 余同元. 传统工匠现代转型及其历史意义.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
- [9] P. Mansa, T. Ramanathan. Migration in Professions by Craftsmen: A Review on the Reasons for Artisans Migration in Bangalore Rural District. *Shanlax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7, 6(1).
- [10] C. W. Chalklin. The Decline of the Country Craftsmen and Tradesmen// G. E. Mingay. *The Vanishing Countryman*. London: Routledge, 2021
- [11] 史建云. 从市场看农村手工业与近代民族工业之关系.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
- [12] 彭泽益. 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 近代史研究,1984,(1).
- [13] 彭南生. 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4] Beisi Jia, Yingying Jiang. Flexibility of Traditional Buildings and Craftsmanship in China. *Open House International*, 2011, 36(4).
- [15] Stobart J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Worlds of Rural Craftsmen-retail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eshire.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2004, 52(2).
- [16] Kuo Yi Jze. The Last Ten Years of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in Miaoxia Village. *Cubic Journal*, 2020, (3).
- [17] 雅各布·伊弗斯. 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手工业的技术定位. 胡冬雯、张洁译. 民族学刊, 2012, (2).
- [18] 焦长权, 周飞舟. “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 中国社会科学, 2016, (1).
- [19] 王星, 周重礼. 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技能重组与小农主体性建构——基于M村制茶产业变迁的过程分析. 社会学研究, 2023, (2).
- [20] 徐艺乙. 工艺美术的发展当与时代相适应. 美术观察, 2011, (6).
- [21] 吕品田. 中国民间美术观念.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7.
- [22] Terje Planke. The Role of the Craftsman in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Kristin Bakken. *Preserving the Stave Churches: Craftsmanship and Research*. Riksantikvaren: Pax Forlag, 2016.
- [23] 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勉县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7.
- [24] David E. Vassberg. *The Village and the Outside World in Golden Age Castile: Mobility and Migration in Everyday Rural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25] 潘毅, 卢晖临, 张慧鹏. 阶级的形成: 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 开放时代, 2010, (5).
- [26] 黄季焜, 靳少泽. 未来谁来种地: 基于我国农户劳动力就业代际差异视角. 农业技术经济, 2015, (1).
- [27] 贺雪峰. 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 人民论坛, 2022, (13).

Career Transition and Skills Change for Rural Artisans

Xu Jiahong, Chi Shuai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kills of rural artisans are of real-world valu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X-village tilers' occupational space and skil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ast 30 years from a life cycle perspective, this study finds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occupational space of rural artisans has been extended from village to county, and further to urban labor markets, and along with the extension, their skills have gone differentiated or upgraded. On the one hand, the more open labor market in big cities than in the countryside gives rural artisans new career space, and they build a new way of life through acquiring new skills or upgrading existing skills. On the other hand, age,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a lack of relevant institutional safeguard challenge artisans in terms of skills upgrading and career transformation. Moreover, a more open labor market has weakened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current rural society, and even made them an unstable labor group for only low-skilled jobs available to them. Since artisans are relatively weak in resisting risks of uncertainty,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skilled personnel requires both institutional labor protec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 cultural atmosphere for craftsmanship.

Key words rural artisans; society of skills; occupational space; skill formation; overage migrant workers; craftsmanship

-
- 作者简介 徐佳虹,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天津 300350;
迟 帅,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 责任编辑 李 媛